

以赛亚·伯林

伯林书信集

卷二 启蒙岁月：1946—1960

① 译林出版社

伯林书信集

Enlightening:
Letters 1946—1960

卷二

启蒙岁月：1946—1960（上）

[英国] 以赛亚·伯林 —— 著

亨利·哈代 詹妮弗·霍姆斯 —— 编

陈小慰 叶长缨 张慧仁 余梅娴 —— 译

陈小慰 —— 统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伯林书信集(卷二), 启蒙岁月: 1946—1960 / (英) 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 著; (英) 亨利·哈代 (Henry Hardy), (英) 詹妮弗·霍姆斯 (Jennifer Holmes) 编; 陈小慰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4

(伯林文集)

书名原文: Enlightening: Letters 1946—1960

ISBN 978-7-5447-7504-5

I. ①伯… II. ①以… ②亨… ③詹… ④陈… III. ①伯林 (Berlin, Isaiah 1909—1997) —书信集 IV. ①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6188 号

Enlightening: Letters 1946—1960 by 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and Jennifer Holm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Serena Moore
Letters from Isaiah Berlin © the trustees of the Isaiah Berlin Literary Trust 2009
Letters from T. S. Eliot © Set Copyrights Limited 2009
Quotations from other letters © their several authors or their heirs and assigns 2009
Editorial matter © Henry Hardy and Jennifer Holmes 200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296号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Isaiah Berlin visit <https://isaiah-berlin.wolfson.ox.ac.uk/>

伯林书信集(卷二), 启蒙岁月: 1946—1960 [英国] 以赛亚·伯林 / 著 陈小慰等 / 译

责任编辑 陈 锐
装帧设计 韦 枫
校 对 蒋 燕
责任印制 单 莉

原文出版 Chatto & Windus, 200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 × 1168毫米 1/32
印 张 49.125
插 页 8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504-5
定 价 188.00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伯林文集



以赛亚·伯林爵士

(Sir Isaiah Berlin, 1909—1997)

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童年目睹俄国革命，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39年借撰写《卡尔·马克思》的契机转向观念史研究。1957年就任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1965年参与创办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

伯林文集

- 卡尔·马克思（1939）
- 启蒙的时代（1956）
- 俄国思想家（1978）
- 概念与范畴（1978）
- 反潮流（1979）
- 个人印象（1980）
- 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
- 现实感（1996）
- 浪漫主义的根源（1999）
- 观念的力量（2000）
- 启蒙的三个批评者（2002）
- 自由及其背叛（2002）
- 自由论（2002）
- 苏联的心灵（2004）
- 伯林书信集 卷一（2004）
- 伯林书信集 卷二（2009）
- 伯林书信集 卷三（2013）
- 伯林书信集 卷四（2015）

特别收录

- 伯林传（1991）
- 伯林谈话录（1992）
- 未完的对话（2006）

编 辑：亨利·哈代 詹妮弗·霍姆斯

助 手：塞琳娜·摩尔

资料补充：布里吉德·阿兰 詹姆斯·查普尔 杰森·法瑞尔
斯蒂芬·戈洛伯（大斯蒂芬）

埃莱奥诺拉·帕格尼尼

档案研究：迈克尔·休斯

誉 写：贝蒂·库尔奎恩 艾斯特·约翰逊

至少，倘若一个人毕生从事一件事，这件事给别人带来莫大烦扰的同时，对其也不无益处，那么，这种烦扰和好处的内中详情可能恰恰以其另一面为众人所了解。

——爱德华·李尔，约 1866 年，致奇切斯·弗特斯克（卡琳福德勋爵），收入李尔的《谐趣歌谣与故事》，第六版（伦敦及纽约，1888），第 5 页

如果经费允许，应该给他们配备真正有才干的助手——可能的话，最好挑选一些做事勤快、有条不紊的女性——协助研究，负责卡片索引编辑等资料整理工作，且这些人对本该有的职位升迁丝毫无求。

——伯林致沃特·伊坦，1951 年 4 月

献给艾琳·伯林

启蒙运动的价值，也即伏尔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孔多塞这些人所提倡的东西，令我深有同感——他们也许太褊狭，对人类的经验事实往往也会判断失误，但他们是伟大的解放者。他们把人类从恐怖惧怕、蒙昧主义、狂热盲目以及种种荒谬绝伦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他们反残忍、反压迫，为了信仰和原则而斗争，与迷信无知以及许许多多摧毁人们生活的恶行不懈奋战。因此，我站在他们一边。^[1]

[1] 以赛亚·伯林*（*表示参见重要人物生平），《伯林谈话录》，第70页。参见《启蒙的时代》（纽约，1956）中伯林序言的结尾：“18世纪最有天赋的思想家们的智慧力量、诚实正直、洞察力、勇气以及对真理的无私的爱，直至今天，依然无人可比。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生活中最美好、最充满希望的乐章。”《观念的力量》，第52页。

序 言

他极爱生活错综复杂，事情越难他越喜欢。^[1]

在伯林书信集第一卷的结尾，也即 1946 年 4 月，他正准备从美国启程，经海上返回英国。在美国，他度过了战争的大部分时期。第二卷开篇之时，他已经回到身为牛津大学教师的生活，重续因为战争中断的学术旧业。

战时在美为国服务期间，伯林总是挂念着远在英国的父母，同时为自己逃避战火毫发无损而感到愧疚自责。尽管如此，他在美国的整个生活状况还算惬意舒心。可是，战后的英国已全然改变。整个国家濒临破产，到处实行限额配给，大规模饥荒迫在眼前。就连天气也变得比以往更加恶劣和缺乏善意。牛津大学很快就挤满了莘莘学子，他们心焦意切，急于立刻补上被耽误的学业，于是其需求只能通过类似生产线批量生产的方式予以满足，这与战前悠然从容的教学氛围有了天壤之别。对此伯林感到特别沮丧，因为这意味着他不得已只能推迟自己的转向计划：从哲学到思想史——这门学

[1] 莫里斯·鲍拉致艾丽丝·詹姆斯，1954 年 9 月 9 日 [牛津大学瓦德汉姆学院档案馆]。

科已然成为他真正的热情所在。

本卷的早期信件勾勒出这个时期伯林心神不宁的双重生活：一方面坚持在牛津教书（主要在新学院），另一方面频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伦敦和熟人朋友的乡间别墅处处可见他的身影。他热情洋溢的交谈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人人都喜欢与他结友作伴。在他的书信中，随处可见他对各种社会奇事怪象充满讽刺挖苦意味的评论。学期结束后，伯林访问了巴勒斯坦，当时正是巴勒斯坦走向独立的关键时期；他还在拯救欧洲各国的马歇尔计划制订中起到了微小却举足轻重的作用。1949年，他在哈佛大学待了六个月，之后又数次前往哈佛。这次初访经历使他在知识上收获颇丰。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回到英国后，他根据哈佛之行的感悟写就的几篇文章，却遭到了来自各界的批评之声。这使他在50年代开始之初，对自我产生了深切的怀疑，坠入人生低谷。但与此同时，这一事件也成为一个转折点。1950年，他回到全灵学院，开始担任思想史研究员，从此仿佛防洪闸门打开，思想的潮涌一发而不可收。这一时期的信件记录了他如何迅速成为知识名流，被八卦专栏和通俗杂志争相追逐。他第二次赴美之行——前往哈佛大学和布林莫尔学院——成就了他在1952年末的系列广播演讲，并使他举国闻名。1951年，他参加了全灵学院院长竞选，但在最后一轮投票前退出；1953年，纳菲尔德学院邀请他担任院长，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后，他婉言谢绝。他喜爱歌剧，并拥有渊博的相关知识，这

使他当选皇家歌剧院和萨德勒斯·威尔斯芭蕾舞团的董事。1957年他当选教授，同时受封爵士（勉强接受，但很快就对此后悔莫及）。

伯林著述甚广：1950年翻译出版屠格涅夫的《初恋》，1953年出版《刺猬与狐狸》，1954年出版《历史必然性》，1956年出版《启蒙的时代》，1958年出版《自由的两种概念》。此外，1955—1956年间还发表了“辉煌十年”，以及众多意义深远的文章和评论。从他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著述从初稿到发表，往往经过了曲折的过程；而面对声名（以及责难），他的反应往往是喜忧参半。

但这些广为人知的方面并非伯林生活的全部。整个20世纪50年代对他而言是情感动荡的岁月，也是性的成熟期。1953年父亲的去世对他打击严重，加速了他对婚姻生活缺乏幸福的艾琳·哈尔本的追求，并与其在1956年走入婚姻殿堂。一夜之间，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住在大学宿舍里的单身教师，一跃而成拥有三个继子的已婚男人，有了自己的家。这一巨大变化自然是本卷后期书信伯林身心日益成熟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段时期，伯林的来往信件比第一卷涉及面更广，题材也更加多样。随着年岁增长，知识方面的内容明显增加，许多信件对他公开出版的著作提供了详尽的解释和背景交代。还有许多信件涉及各类书籍、音乐、城市、乡村，更多是围绕人有感而发，视角敏锐，并大多尖酸刻薄。伯林的足迹遍

布欧洲和美国、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56年，他还偕新婚妻子完成了苏联之行。这些经历向他展现了充满变化的战后世界，这个世界与牛津的狭小世界全然不同。对此他的印象和感触都写在他的书信中。他与数国政要之间的交往关系，使读者得以窥探到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内部核心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些事件包括以色列建国、苏伊士运河危机，再就是冷战。总之，他的信件为我们提供了信息丰富同时又个性鲜明的视角，来审视这些信件背后的时代。他的书信还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们看到他个人在学术上的成长。

对编辑的挑战

请原谅，比起你文采斐然、情真意切，同时又不偏不倚、优美流畅，外加赏心悦目、令人赞叹的来信，我的回信自愧不如（以上这一连串形容词像是对我本人令人遗憾的文风的拙劣模仿，最近有人在《笨拙周报》里模仿了我的书——谈不上天衣无缝，但我自认为从中还是略有所获——没完没了的长句，这是模仿我的首要基础）。^[1]

xiv

随着身心的成熟，伯林书信的文风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讥讽嘲弄开始取代早期的青春活力。同样，在本卷后期的书

[1] 致莫顿·怀特，1954年3月15日。

信中，有一些令人瞩目的连珠妙语，与他早年的风格也不尽相同。但某些个性特点一如既往。例如，复杂费解的长句和形容词始终充斥在其书信中，随处可见。还有一个意义重大的改变是，1949年他发现了口述记录机；从那以后，他的大部分信件都经过口述记录转换而成，逐渐替代了普通谈话经常出现的多少有些放任自流和容易跑题的特点。但简洁并非他的天性。大多数信件都冗长无比，话题涵盖面极广，飞短流长与睿智分析夹杂其间。编辑的职责之一，就是在不可避免的选择过程中尽力保留这一个性特点。

筛 选

在我看来（作者们往往也有此错觉），这些全都是不可或缺和不可删除的，否则就会给意义造成重大损失。^[1]

我相信，出版的即便是轻率选取的文献，大家的所得也会远远大于所失。但将来总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带来无穷后患，不如当初就将其公开、率直、及时地出版。^[2]

战后幸存的信件数量巨大，篇幅也长，因此比起卷一，

[1] 致汉密尔顿·费希·阿姆斯特朗，1951年11月21日左右。

[2] 致波利斯·格里尔，1957年1月1日。

我们对本卷收入的信件筛选更加严格（之后的卷集也必须如此）。^[1]一方面，这的确令人遗憾，但也因此迫使我们得以集中精力，专注于最引人入胜的素材，也算是个不无益处的补偿。书信集卷一中收入了大部分 1946 年 3 月前能找到的信件，而本卷时间跨度内的信件若加起来，同样厚的书足可出四到五本。我们只好忍痛割爱，完全放弃卷一遵循的书信出版方针，因为那些删除的信件如果尽数收入，成本就太大了：许多信件不得已舍去，以保留在我们看来最生动有趣或最重要的特色。

一些删除尽可大刀阔斧：比如伯林错综复杂的旅行安排，不断地计划，反复再反复，最后常常放弃，这方面内容无关紧要，直接删去无妨；还有他与父母之间纯粹话家常的信件也删去了。很多时候，会有同时给几个人写信提供相同信息或表达相同观点的情况，对此我们通常会选择最完整或
xv 最有趣的予以保留，以降低重复率。可是，最终要确定选用哪些信件或保留哪些内容却并不容易。我们一直致力于客观呈现伯林来往信件的全貌，同时也不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会有一些先入之见反复出现，比如他自认为缺乏成就（哪怕选用的信件增大了内省的部分）。我们很少去想哪些内容会

[1] 但是，我们仍然欢迎读者为我们提供所有我们不曾了解到的有关伯林书信，或是可能获得这些信件复印件的相关信息。请致信给亨利·哈代，地址：Wolfson College, Oxford, OX2 6UD, UK；电子邮箱地址：henry.hardy@wolfson.ox.ac.uk。

美化（或丑化）伯林，而只是单纯凭着对信件材料的本能兴趣着手筛选。对个别一开始就存在争议的选择方案，我们会通过协商，相互让步达成一致。虽然大家见仁见智，各有所爱，我们还是希望，亨利·哈代对伯林思想的热情，与詹妮弗·霍姆斯对这些信件作为社会和政治历史见证的兴趣能够很好融合，为读者带来一部能够引起广泛兴趣的书信选集。^[1]

如上所述，本卷所做的删减基本全部基于不同兴趣而定，但也有两个例外。偶尔，我们会出于对尚存活于世的人的考虑，删除某封信件或段落。另外还有一块更为重要的删减内容（根据收信人的愿望），即伯林写给妻子艾琳的大量信件。主要在两人结婚前的1954年和1955年期间。这些信件展现了伯林天性中在其他场合不常见到的激情的一面。非

[1] 亨利·哈代注：詹妮弗·霍姆斯在卷一筹备阶段加入本团队，我曾在序言中谈到她起的作用多么重要。在本卷编辑中，她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就许多方面而言，这本书的主要编者是她而不是我；读者千万不要被封面上的排序误导，那不过是按姓名字母顺序排列罢了。虽然主要素材由我搜集，筛选却是两人共同完成的。詹妮弗承担了几乎所有关于编者按、注释、年表和重要人物生平的研究工作，并起草了所有相关文字。此类研究需要超乎常人的坚持不懈以及挖掘信息的能力和知识面；撰写成文时又需要对收入哪些内容做出果断判断，同时对措辞精益求精。为了使本卷长度不超过许可范围，在不断的努力和挣扎中，她所具备的丰富常识、现实主义态度以及果断和魄力，一次又一次地成功制止了我，使我不至于因为任性与不舍，随意保留或删减。对她起草的内容，我常常 would 发表一些卖弄学问并很可能是多余的迂儒之见，她不仅坚强地包容承受，还说服我放弃了一些强迫色彩过于浓重的编辑毛病，坚决拒绝做出任何丧失品位和判断力的选择。她对我的恩惠真是无以计数；若没有她，这本书不可能在目前这个时间完成，也不可能现在有这个水平，甚至能否完成都很难说。